

全国高等学校重点规划系列教材



国学导论

曹胜高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全国高等学校重点规划教材

国学导论

GuoXue DaoLun

曹胜高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学导论 / 曹胜高主编.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7-04-042287-0

I. ①国… II. ①曹… III. ①国学—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Z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90452 号

策划编辑 张晶晶 责任编辑 张晶晶 封面设计 张文豪 责任印制 蔡敏燕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邮政编码	100120		http://www.hep.com.cn
印 刷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http://www.hepsh.com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印 张	17.5		http://www.landaco.com.cn
字 数	377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购书热线	021-56717287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010-58581118	定 价	32.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42287-00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经学导论 11

第一节 儒学的形成与发展 12

第二节 经学的文献形成 19

第三节 经部的演变 27

第二章 史学导论 33

第一节 史书的编写 34

第二节 史部的形成 41

第三节 史学的功能 45

第四节 历史的认知 51

第三章 子学导论 57

第一节 子部的形成 58

第二节 诸子的学理 64

第三节 子部文献的阅读 75

第四章 文学导论 81

第一节 集部导论 82

第二节 诗歌的演变 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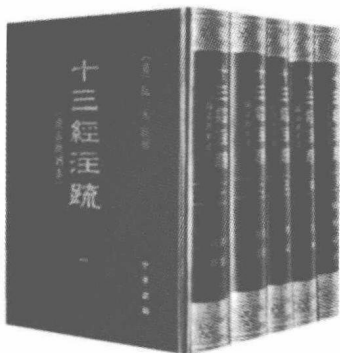
第三节 散文的分类 95

第四节 小说的类型 98

第五节 戏曲的演化 102

第五章 国学的基本命题 105

第一节 道与德 106



第二节 仁与义 112

第三节 礼 120

第四节 法 124

.....

第六章 国学的观察视阈 129

第一节 天人关系 130

第二节 人伦关系 135

第三节 身心关系 143

.....

第七章 国学的学理演进 153

第一节 从巫史到诸子 154

第二节 从儒学到玄学 162

第三节 从道教到佛教 171

第四节 从理学到心学 182

.....

第八章 国学与自然科学 193

第一节 数学 194

第二节 物理 203

第三节 化学 213

第九章 国学与心性修为 223

第一节 个人发展 224

第二节 心性修炼 228

第三节 人格修为 233

第四节 境界提升 236

第十章 国学研读入门 241

第一节 为何读书 242

第二节 如何读书 248

第三节 国学研究素养 255

第四节 国学研究入门 260

参考文献 268

后记 271



绪 论

最近十年,“国学”成了热门词汇,铺天盖地而来,一时间妇孺皆知。但什么是“国学”?如何理解“国学”?却一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国学,看到的内涵和外延也就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可以从文明史、文化史、学术史三个维度对国学进行审视,并思考国学对我们个人成长的影响。

一、文明视野中的国学

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其他三大文明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中断了,古印度文明大约消失于公元前 1000 年,两河流域文明衰落于公元前 224 年,古埃及文明灭亡于公元 303 年。唯有中华文明绵延了五千多年没有中断,这就不得不让我们去仔细思考,中华文明是如何兼收并蓄、包容并举而不断壮大的?中华文明是如何吐故纳新、与时俱进而不断发展的?

文明是体现在人类演进过程中的民族意识、礼仪规范、宗教思想、风俗习惯、科学知识以及技术水准等要素的总和,是人类对自然、社会与自我认知的总结。任何一种文明的产生,都是在特定地理环境和漫长历史进程中交合作用的产物,文明的产生环境和萌发过程,不仅决定了这种文明的根本特点,也决定了其后续发展的整体走向。

中华文明就其发展的阶段性而言,大致可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至明中叶、明中叶至辛亥革命四个时期。^①

先秦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发生期。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文明由多源萌生、分途发展逐步走向一体化。生产力的进步、国家的形成、社会的发展以及多元文化的融合共生,奠定了中华文明的一些基本特征,如国家意识、宗法制度、礼乐观念等,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生活方式。

秦汉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文明的形成期。在这一时期,中华文明所面临的问题是传统的自身调适,即如何适应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建立起完善的行政制度和政治学说,形成稳定而充满生机的经济政策;协调华夏各民族之间的冲突,使之走向融合;构建起与国家形态相适应的文化体系,以及处理外来宗教与传统信仰之间的矛盾等。特别是国家在分裂中追求统一、社会在对峙中走向融合、文化在争鸣中实现交流,形成了中华文明基本的思想认知。

唐宋至明中叶,既是中华文明的成熟期,也是完善期。这一时期在发展经济生

^① 袁行霈、严文明、张传玺、楼宇烈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17页。

产、完善行政制度、繁荣学术文化的基础上，侧重解决中华文明与周边文明之间的冲突。不同文明之间的攻守，并没有导致中华民族的分裂，反而促进了中华文明更大范围的传播与发展。唐朝的开拓、宋辽金的对峙、元朝的统一、明朝的建立，中华文明与周边文明的相互交流、吸收，形成了更为深广博大的文明形态，各种不同形态的文明也随着民族的融合参与了中华文明的建构，形成了中华文明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

明中叶以后，一方面生产模式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冲击着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和固有的文化观念；另一方面中华文明遇到了异质文明的挑战，如何在调整自身文明形态的同时，吸收、兼容不同的文明形态，是这一时期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清中叶的经济调整、清后期的政治改革以及辛亥革命的发生等，既是对中华文明自身传统的调整，也是在与西方文明交流过程中的相互适应。

中华文明的发展，就一朝一代观察，似乎是静态的；但就文化演进来看，却是不断变化的。中华文明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历久而弥新，正在于既能坚守自身文化传统，又能充分吸收外来文明，不断调整，永无止境，才能够生生不息地延续至今，还将继续走向更遥远的未来。

文明的发展，常常表现出两种形态：一是文明的扩张，一是文明的内敛，二者又分别可以表现为武力的扩张与内敛、文化的扩张与内敛等。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正在于武力内敛与文化扩张的协调统一。中华周边文明常常在攻伐中原文明的过程中，主动或被动地受到中华文明的吸纳，参与到中华文明新一轮的调整与建构中。因而当异族文明进入中原之后，往往带来的不是中华文明的萎缩，反而是中华文明的繁荣与新生。如青铜文化的产生、马车的使用及生产技术的全面发展，诸子兴起、儒道形成和佛学的中国化，官僚政治的确立、文官体制的完善以及官吏制衡机制的形成等，都是中华文明在坚持自身传统，而又吸收周边游牧文明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起来的。

明中叶以后，中华文明开始与西方的异质文明交流，这对中华文明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因为此前的文明冲突所带来的融合是地缘性的，相似性多于差异性，如汉与匈奴、唐与突厥、宋与西夏金元等的冲突。在这些过程中，中原文明在生产、制度和文化上是处于领先地位的，因而在大量的物资交流、频繁的人员往来和领土攻守之中，周边文明接受并认同了中华文明。但在明中叶以后，由于政治的因循和文化的保守，中华文明失去了与西方现代文明同时起步的历史契机，在生产技术上逐渐落后。

在这种挑战面前，我们需要坚持文明的自主，主动而不是被动地从西方文明中吸收物质、精神和政治的经验，用中华文明的兼容并包意识、自新自立精神，来审视我们的文明形态，用一种开放、刚健、乐观、自信的态度来面对文明的冲突和交流。这一形态之所以形成，完全得益于中华文明内部控制和协调机制的建立。文明的发展，既有赖于对固有传统的坚持，更有赖于开放包容的精神，前者是保持文明延续的必要前提，后者是促进文明发展的充分条件。以复古为革新来处理行政制度，以通变意识来调整经济体制，以雅俗互动来发展文化艺术，中华文明正是通过这些

自我调控机制，保证了文明的持续发展。

了解中华文明，我们会意识到：政治理想的长期稳定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相对完善，使中华文明选择了内敛式的政治文明，即不断完善政治文明，不断调整经济体制，不断吸纳外来文明，以实现《礼记·礼运》中所描绘的小康社会，去追求大同理想。在这种以内部调整为动力的文明传统中，国家的繁荣和发展不是依靠外部的掠夺和占有，而是依赖于内部体制的自我更新和经济模式的自我完善，来渐次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这种内敛的政治文明，伴随着先进耕作技术和科技知识的发展，推动了中华文化向外扩张，辐射到周边国家，形成了具有独特内涵的中华文明圈。

不知过去，无以图未来。如果把中华文明视为传统之江河的话，那么，正处在河流中下游的我们，就必须了解这条河从哪里起源，流经何处；我们同饮的一江水，究竟是怎样的成分。我们所理解的国学，正是基于文明史视野中对中华文明的观察与反思，试图寻找到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思想观念、文化形态、学说资源、研究方法，总结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核心命题、基本学理和观察视角，勾勒中华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律、发展模式和历史经验，以此作为我们面向未来的思想基础、学理支撑与经验总结，成为我们在世界文明激荡中站稳的基石。

二、文化视野中的国学

文化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方面的一切习惯与经验的总和。文化会因地域、文明、宗教与生活环境的不同，形成群体差异；也会因个人经历、教育和心性修养的不同，呈现出个体差别。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演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经验与社会认知，体现在物质形态、精神文明、政治体制、风俗习惯、思想意识和文学艺术等多个维度之中。

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不同。传统文化是历史形成的文化资源，文化传统则是历史形成并留存下来的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传统，如孝道观念、节令习俗、宗教意识等活在老百姓心中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我们面对中国文化，一方面要从传统文化中找到有益社会发展、适应时代需求的文化资源，如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模式、民族交流经验等，兴废继绝，为当代所用；另一方面更要把历经数千年流传的文化传统传承下去，推陈出新，使文化传统更具有现代意义。

传统本身具有强大的内在约束力量。例如在中国文化中，信任是熟人社会交往的基础，是人际关系的底线。有时候亲朋好友借钱，按照法律来说要打借条，但有时如果让对方打借条，对方会觉得这是侮辱他，两人关系或许就因此疏远了。这是因为在中国文化的认知中，法律是维系社会关系的最后手段，而人际交往中，在法律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道德要求。中国古代在治理国家时非常注重教化，即培养国民的道德认知，提高社会的道德标准，然后再来要求人的行为规范，在此之后才进入到法律层面，这便是“德主刑辅”。它主张在大家心中树立道德的内在约束，这种约束会使人在遇到事情时，有一个做事的底线，有做人的原则。这种底

线、原则不是出于对法律惩处的畏惧，而是出于对高尚道德的内在追求。这种对道德的内在追求，来自于个人从小受到的文化教养，是从家族的言传身教、学校的行为规范、社会的潜移默化中不断形成的，成为对是非的基本判断、对社会的根本认知。

现在大力提倡传统文化，是因为在过去的两百年时间里，我们的传统文化被忽略了。忽略的原因很简单，我们一度把传统视为包袱，认为过去的东西都是腐朽的、没落的、封建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在过去的两百年中，对中国文化有较多的误解。

在清中叶之前，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的最大经济体，皇帝自称天子，认为中国是天下之中。但当西方开始工业革命时，中国却没有跟上这一潮流，技术的落后导致了生产力的滞后。这一滞后的直接结果，便是鸦片战争的失败。失败之后，我们开始反思：曾经如此强大的国家就这么被打败了，原因何在？经过反思，最终认为是军事技术落后，那就“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在思想界的魏源、冯桂芬等的呼吁下，在军政界的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的支持下，在实业界的沈葆楨、刘坤一、唐廷枢、张謇等的努力下，清政府开始推行洋务运动，开设西式学堂，建立现代工业，组建新式海军。可结果却是：甲午战争又失败了。新组建的北洋海军实力远超过日本，为什么又失败了？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经过反省，便认为清朝是君主专制，而日本是君主立宪制，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政治制度的落后。于是全力推动维新变法，进行政治改革运动，可惜的是，戊戌变法犹如昙花一现，很快夭折。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更认为立宪在中国走不通，只有建立共和制度，结束君主专制，才能使得中国强大。辛亥革命后建立了中华民国，没想到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却复辟称帝，居然还有不少人跟着摇旗呼应。这几轮折腾下来，大家最终意识到，中国在近代之所以落后挨打，不在于技术、不在于制度，根源似乎在于文化。

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新”是相对于“旧”而言。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现实面前，在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焦虑之中，中国传统文化被一概视为落后的、陈腐的、没落的事物，成为被讨伐、攻击、毁灭的对象，中国传统文化被贴上了各种各样的标签，在移风易俗的运动中不断失传。甚至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习惯性地认为：中国近代的落后是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

这种认识的存在，实际是忽视了思想发展和历史发展之间的不对称性。从中国乃至世界史的范围来看，新思想的兴起或者说思想的解放，并不必然发生在王朝的鼎盛时期，而恰恰相反：它们多数产生于政治统治较为薄弱的地区或历史阶段，有的还产生于激烈的社会冲突之中。中西两种思想体系的源头，分别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和古希腊时代，它们皆不处在历史最为鼎盛的阶段，孔子、孟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在的地区，也不是政治军事力量最为强大的地区。更能说明这一问题的是，世界历史上常常存在着相对文明的国家或地区被相对野蛮的部落所征服的情况，而这些相对文明的地区，恰恰处于人文思想、政治形态以及生产技术更为发达的阶段。这也就说明了人文思想的发展程度并不与历史发展的进程完全对应。中国近代

的落后，是清政府在政治、军事、生产、社会等多方面措施不当造成的，但不能由此全盘否定中国的历史和思想。

在过去的两百年中，我们意识到落后就会挨打。于是以奋力追赶的心态面对西方兴起的科学技术，落后产生焦虑，焦虑便会功利，让我们习惯性地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将西方的一切都视为现代化，认为先进的技术必然带来先进的人文思想，有意或无意地放弃了对中国文化的坚守。这一认知的弊端，随着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社会文明的发展，越来越清晰地暴露出来，特别是在人文社会领域中的许多问题，我们根本无法用基于西方学术研究形成的定理、公式进行解释，更无法用西方的行事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

这是因为，衡量一种人文思想、社会理论的进步与否，首先要看这种思想理论与社会需求的契合程度。过分超越现实环境的人文思想或者说无视社会需求的社会学说，尽管可以带来理论上的公平和效率，但在没有得到实践之前或者无法在现实中得以实践，都只能视为理论上的“先进性”。而且，西方在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过程中，并没有如科学技术进步那样迅速地解决人文的、社会的问题。在科学技术最为发达的地域以及最为迅速的发展阶段，并没有必然形成最为辉煌的、最行之有效的学术思想体系。相反的是，近代欧洲许多有影响的人文思潮、社会思想和文艺作品，却产生在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家或地区。这就说明了科学的现代化，并不会必然带来人文与社会的进步。

人文学科求美，社会学科求善，这与自然科学求真是不完全一致的。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是其思路和结论，如何服务于特定时代、特定地域中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需求，并在最大程度上响应这些需求并提出解决之道。在文化多元化、社会多样化普遍存在的当代，人文思想和社会理论必须结合着不同的社会形态、历史进程进行研究，才能学之有用，才能行之有效。

国学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理总结，主要侧重于讨论、分析和总结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以贯之的思想、精神、观念与方法等。我们了解国学的目的，不是为了钻故纸堆，而是为了寻找到滋养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养分，寻找到活在我们灵魂深处的那些思想和观念。大而言之，让中国在科技进步中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以致无所适从；中而言之，让社会在经济发展中不要失去价值认同，以致一盘散沙；小而言之，让我们不会因为现代文明而失去文化基因，以致自我迷茫。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学是中国的学脉、文脉，更是中华文化的气脉、命脉。了解国学，研究国学，传播国学，不是要因循守旧，而是要推陈出新，去芜存精，吸收前人的智慧，总结历史的经验，为我们现在的发展提供滋养，为我们未来的走向提供参照。

三、学术视野中的国学

国学是研究中华传统学术精神及其载体的学问，是对中华民族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与生态文明进程中形成的、具有永恒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思想体系、文化观念与学术方法的总结。

作为思想体系，国学存在于经、史、子、集四部典籍中，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如《周易》《老子》《论语》《孙子兵法》《黄帝内经》《坛经》等，承载了中国古代关于天人关系、人人关系、身心关系和人神关系的理解，构筑了中国思想的根基，成为驱动中华文明延续、发展和自新的内在动力。

作为文化观念，国学是沉浸在中华文明进程之中的习惯、认识和价值判断，体现着中国人的精神气质、文化追求和审美情趣；作为文化传统，国学的精髓绵延不绝，有些直接深入到我们的价值取向、风俗习惯和生活态度中，成为中国文化的灵魂。

作为学术方法，国学在传承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方法，如版本的考订、目录的编纂、校勘的方法、辨伪的原则、辑佚的实践、训诂的使用等，在经过了长时间的积累和无数学者的总结后，成为研究文献典籍、理解思想学说、分析文化形态的基本手段。

按照四部分类法，中国传统文献分为经、史、子、集。之所以把“经”列于四部之首，作为四部的内容核心，是因为“经”字在古代具有“经常”的含义。织布机上分有经线和纬线，经线是恒定不变的，纬线穿梭于经线之间，纵横交错，华而成章。古代把最常用、最基本的典籍都称为“经”，如《黄帝内经》《道德经》《南华经》《心经》《金刚经》等。其中，儒家典籍成了察举、科举用书，《周易》《诗经》《尚书》《仪礼》《春秋》《孝经》等日渐被重视，先后以“五经”“七经”“十三经”等合称出现，成为中国的核心文献，合称“经部”。

经部文献阐述的是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理念、精神追求、群体共识和价值认知。也就是说，经学所思考的是整个中华民族所要面对的基本问题，如人之何以为人？人之何以能群？天命与人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社会秩序如何形成？如何建立一个理性的国家体系？如何评判政治的得失？个人、家国与天下的关系如何？通过周秦时期形成的文献典籍、原始儒家的解释和后代儒生的注释，把这些学说逐步固定下来，作为历朝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运行的参照，这是经学的基本使命。

经学之所以能够超越于朝代而代代相传，正在于其承载了中华民族最基本的理念，可以视为中华民族解决冲突、观察得失、衡量成败的最大公约数。假如中国历史是一排房屋，那么经学就是这排房屋的屋脊，是整个中国文化的骨架。

相对于经学而言，史学更多关注的是一个或几个朝代。清人所编的《明史》，代表了清朝人对明代的看法；明人所编的《元史》，是明人对有元一代的总结；同样，《宋史》也是元朝人对宋代历史的理解。即便是古代通史，也只是一朝一代对前世的理解，司马迁的《史记》，既是司马迁自己的看法，也代表了西汉前期史官对历史秩序的理解。这是因为历代修史的目的，一是明正统，确立本朝的合法性；二是述得失，总结前朝覆灭的教训。自班固《汉书》开始，后世正史、政书皆由官方主导编撰，史学所思考的问题很难跳出时代的局限。

经与史的区别，在于“经”可以贯穿历朝历代，历久弥新。汉人尊《尚书》、尊《诗经》，唐朝人也尊《尚书》、尊《诗经》，之后依然如此。“史”就不一样，虽然后

代也读前代史书，但对于前代的某些评价，后代有时候会不认同，不认同就要重修。单就“二十四史”而言，其中有《旧唐书》与《新唐书》，《旧五代史》与《新五代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之外还有《南史》；《魏书》《北齐书》《周书》之外还有《北史》。其实这些史书的重修，只是对局部史实进行了修订，大部分的人物事件并没有变化。而重修的目的，主要是对某段历史的前因后果进行新的解释，对某些人物按照其他标准重新评价。所以说，“史”与“经”不同，“史”所代表的只不过是若干时段内的历史认知、文化立场与价值判断。

子学更多的是一个学派的主张。一个学派类似于现在的一个圈子，一个圈子代表着一些人的共识，只有在这个圈子里的人才可能认同这种主张。汉代人把先秦学者分为九流十家，每一家都代表了某一群人对社会的理解、解决现实困境的策略。从共时性来看，他们之间的争执，在于坚守本家本派的立场；从历时性来看，各家皆有后学赞同、传播或者赓续他们的立场，如道家后学推崇《道德经》、兵家后学推崇《孙子兵法》等，体现了他们有着内在的学理延续性。他们有时也会将自己推崇的经典称为“经”，如《庄子》被后学推崇为《南华经》，兵家后来也编有“武经七书”、《武经总要》等，但这些“经”实际是子部文献，并非文献学意义上的经部著作。因此，我们认为“子”代表的是一批人、一类人的共识，不是说其思考问题的狭隘，而是说其所提出的观点及所表述的内容是一部分人的理解与看法，相对于“经”来说，并不要求成为社会的全体共识。

集部文献更多体现的是个人的见解、个人的思考与个人的情感体验。集部作品最大的特点是个性化，一人一个性情，一文一个特色。心有千千结，景则仪态万方，心与物相遇、情与景相逢，就生出了无穷无尽的诗情画意，再加上诗、词、曲、赋等文体的差异，文学的表达便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经学虽然也可以被翻来覆去地解释，不管怎么解释都能出新，每个人都能提出新看法、新见解，但万变不离其宗，正在于经学中基本的共识、基本的理路不能被否定。文学则不同，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有一代之作家，文学创作要不断出新，好的作品必须是崭新的，后世只能超越它，却不宜模仿它。

我们研究古典文献，要把经、史、子、集放在不同的层面上去考量：经学的立意在于思考社会共识、天下之事与人类命运；史学着眼于阐释一个朝代的兴衰成败，侧重于观察一家、一国、一族、一区、一事之变迁；子学致力于解说各家观点，以某一立场阐释对社会的理解、对人生的思考；文学的立足点是传达一己之情绪、个体之感受，抒写人同此情、情同此理的人生体验。所以说，文献学上经、史、子、集的分类方法和排列顺序，大致有这样一个基本的思考在其中，体现出由天下至于家国、由群体至于个人的观照视角，我们阅读古代经典，可以从这个视角来审视四部文献的差异。

这就决定了我们所讨论的国学，是基于中国传统学术立场的思考，是按照文献处理方法、学脉传承方式和学术研究方法而进行的，进入到经典阅读和学术研究的语境中，按照传统学术的理路观察、思考和处理传世文献，结合现代学术方法，进行更为有益的探索，沉浸其中，超乎其上；守正出新，后来居上。

四、修养视野中的国学

宋人张载说：“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不尔皆为人之弊，卒无所发明，不得见圣人之奥。故学者先须变化气质，变化气质与虚心相表里。”^①我们读书做研究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讲求知行合一。

大学阶段是一个人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确立的关键时期。四年之后，我们将从一个懵懂的大学生，变成踏入具体工作岗位、肩负国家建设职责、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栋梁之才。在大学之前，我们的生活习惯来自于父母的督促，所学的知识来自于题海的训练。到了大学阶段，需要对心性修为进行全面提升，养成个人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和工作态度。如果说，高中阶段分出了学习和智力的高下；那么，到了大学才分出了见识的高下和能力的强弱。一个人未来的成就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四年所获得的知识、所训练的能力和所养成的修为。

知识是在学校、社会和家庭中获得的基本概念、常识、定理、规则等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成果；能力是运用知识进行工作、生活的基本技能，包括知识转化能力、科学创新能力、团队组织能力、工作协调能力；修为则是一个用怎样的格局去面对世界、用多高的境界去观察人生、用多远的视角去面对生活。

《大学》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②大学阶段正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起步阶段，是自己未来事业的基础性铺垫。可以说，一个人能否担当未来的家国责任，在大学阶段就开始初步形成。自己未来要做什么样的人，要成什么样的事，取决于自己在大学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学。

读大学的时光，我们与那么好的同学、好的老师日日相处，可以学到多少自己从未听闻的知识，可以见到多少此前没有见过的奇人奇事、高人牛人。与他们交往相处，我们会逐渐体悟出性分三品、人有九流，不断提高自己的鉴别能力和处事能力。宽厚之人，师以养量；缜密之人，师以炼识；慈惠之人，师以御下；明通之人，师以生慧；质朴之人，师以藏拙；才智之人，师以应变；缄默之人，师以存神。一个人未来发展得怎样，与自己在大学读书期间所培养的兴趣、所养成的习惯、所交往的朋友紧密相关。我们与贤者善者为友，可以育浩气，养心性，做到气象高旷，心思缜密，趣味冲淡，操守严明；与高者智者为伍，可以长见识，明成败，做到接人中和有介，处事精中有果，认理正中有道。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在知识面前，我们所知的不过是沧海一粟。面对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阅读那些历久弥新的经典性著作，阅读那些前代先贤的人生感悟、理性思考，就会发现在中国传统的经典中，有那么多先贤伴你左右，有那么多睿智的言论不绝于耳，有那么多细腻的情感可以品味，有那么多超脱的想象供你遐思，如若沉浸其中，可以与贤人高士为友，可以与英雄名臣为伍，越关山，走沧海，无边大漠、有情流水，完全可以让我们忘却尘俗的琐屑，让心灵获得暂时的栖息。

^①（宋）张载：《张载集·经学理窟·义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74页。

^②《礼记·大学》，《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859页。

我们在读书学习的时候，要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追求什么，需要放弃什么，那就要总结前人的经验，明白自己何去何从；要明白人性的高下，从容面对社会现实；要知道什么最为珍贵，学会珍惜与放弃。在这其中，我们要让自己成熟起来、干练起来、睿智起来、稳重起来；减少私欲，增加友善，开阔心胸，锤炼意志。要能用温文尔雅的君子之风约束自己，用睿智果断的将帅之气锤炼自己。如果能如此坚持四年，我们便能达到“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境界。

如果我们能够按照中国传统文化中培养君子道德人格的要求来修养自己，清明以养神，湛一以养虑，沉警以养识，刚大以养志，果断以养才，凝重以养气，宽善以养量，严明以养操，不断提升自我、锤炼自我，不知不觉在读书之余，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的朋友已换了一茬，而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也改变了许多。若每天每年都能坚持如此，等大学毕业时，我们会发现，其实在自己面前，已不是千军万马拥挤的独木桥，而是青天般开阔的大路。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第一章

经学导论

— 儒学的形成与发展

— 经学的文献形成

— 经部的演变

儒、释、道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就其基本用意而言，儒家关注人生，探讨的是如何完善自身的修养，更好地参与社会的运行，肩负起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道家关注精神，思考的是如何超越现实的局限，早期的道家渴望天性的保全，后期的道教则期待肉体不朽、长生不老，希冀在现世一直延续自在的生活；佛教关注超脱，试图用觉悟摆脱眼下的痛苦和烦恼，以追求来世的幸福。在这其中，儒家直面个人的发展，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导力量。

第一节 儒学的形成与发展

儒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支配中国近三千年历史进程的主导学说，不仅在于它的理论形态与国家形态、政治形态、帝制形态之间的契合，更在于它的思想倾向与精神追求符合古代士人阶层的文化心态和人文理想。儒家学说作为中国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不仅成为士人修身治国的理论基础，而且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

一、儒学的形成

甲骨文中的“需”字，字形象以水冲洗，沐浴濡身。这是因为古人在举行祭祀天地、享祖事神等重大仪式之前，都必须先沐浴斋戒。《孟子·离娄下》中说：“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①因此，“儒”本义，指的是专门在殷商贵族等祭祖事神、以礼祈福时出任司仪的人。殷商尚巫重祭，这些人不仅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且精通礼乐；不仅能够参与礼仪活动给人以示范，而且能够引导百姓向善、解释礼乐内涵。东汉郑玄注释《礼记》时，对“儒”的解释是：“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②便是说儒者养成了一副斯文模样，性格柔顺，临事沉着。到了周代，司徒负责教化民众，儒生协助君王顺应天时、明习教化，逐渐担负起教育的使命。所以班固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③认为儒者能够帮助国君以教育引导百姓，改善民风。

儒家学说的形成，以周公制礼作乐为起点。周公旦（？—前1105）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因他的封地在周（今陕西省岐山县北），世称周公。周公旦自幼德行仁厚、博学慎思、多才多艺。周武王死后，其子周成王年幼继位，由周公摄政监国。周公代行天子之政，先平定了“三监”叛乱，后分封建国，营建东都，制礼作乐，辅国安邦，功勋卓著，但却从不越礼逾制行事，七年后还政于周成王。周公参与了殷周更替的整个历史进程，对国人、民众的力量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只有实行

① 《孟子·离娄下》，《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2页。

② 《礼记·儒行》，第1841页。

③ 《汉书》卷30《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28页。